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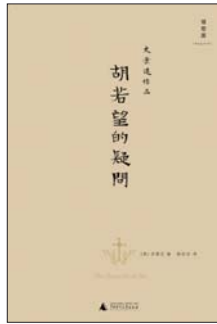
再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，史景迁已近耄耋之年。他的两部中文新译版作品《曹寅与康熙》、《胡若望的疑问》已经出版，另一部著作《改变中国》很快也将问世。

这位耶鲁大学汉学家所到之处，总会被热情的粉丝团团围住，读者争着索要他的签名，或只是为了远远地一睹他的真容，如果有幸提问，也不忘问问他最想和哪位中国皇帝交朋友。

誉之所至，谤亦随之。史景迁以研究历史中的底层小人物闻名，但这也为其招来争议。喜欢他的读者赞其文笔生动，视角独特，而批评者常常引用据称是钱锺书对他的评价——“失败的小说家”，以质疑其缺乏历史的实证精神。



《曹寅与康熙》



《胡若望的疑问》

## 史景迁： 会讲故事的美籍汉学家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### 像明星一样被追捧

从2月底抵达北京后，史景迁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忙碌的中国之旅。从北京到成都、西安，再到此行的终点站上海，史景迁的行程横跨大半个中国。他的讲座一票难求，在北大，虽然讲座地点从180人的教室换到了380人的大教室，仍不能容纳蜂拥而至的人流。3月9日晚，他出现在中央美院美术馆，出席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场讲座，观众席上出现了作家王蒙、诗人西川、历史学家李零的身影，观众们认真地听史景迁讲述“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”。虽然需要通过翻译才能明白他的意思，但这并不妨碍大家的热情。讲座开始前，提前抵达的史景迁刚一出现，热情的粉

丝立即一哄而上将其团团围住，手捧他的著作，希望得到一个宝贵的签名。

在史学界，这样的盛况并不多，只有前些年在百家讲坛成名的明星学者有此待遇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不知史景迁本人可否有恍若隔世之感。1989年，史景迁首次来中国讲学时，尽管他的《王氏之死》已经引起北大教授乐黛云的注意，但他的著作尚未在大陆受到关注，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，“史景迁热”尚未形成。他当时应邀来中国，在北大一连8场讲座更多的是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界打开一扇窗户，起到跨文化交流的作用。

直到现在，他谈的主题也多围

绕“西方人如何看中国”，此次中国之行，他的讲座题目包括“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”、“一个美国人眼里的中国”。这也是多数汉学家来中国的必讲题目。从中可以看到近年来史学界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外国学者书写的中国历史、中国问题往往更受读者的关注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史景迁曾在一次受访中解释了读者的这种偏好，他将其归结于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，而外国学者的观察角度有所不同，“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，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，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一种现象”。

### 从老生常谈的历史中发现新视角

1936年出生的史景迁，对中国的兴趣源于幼年一次偶然的阅读。在他6岁时，读到一本中国艺术史，里面有关于中国画笔墨的介绍，“后来在二战时期我对中国产生了英雄式的崇拜，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”。

23年后，作为剑桥大学的交换生，史景迁来到耶鲁求学，此时的他连一个汉字也不认识。几年后，当他将康熙皇帝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，发现这位清代帝王在一些朱批奏折中，将“密”误写作“蜜”，遂对他产生理解之同情，因为康熙也是在成年后才开始学习汉字。

耶鲁大学是二战时期美国进行中日研究的重镇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在这里任教，史景迁在此学习繁体字与文言文，奠定了他汉学研究的基础。此后，他的导师又向他推荐了澳大利亚汉学家房兆楹，也正是跟随房兆楹求学期

间，他获得了现在的这个中文名字。“景迁”意指景仰司马迁，房兆楹为爱徒取这个名字寓意明显，期望他学历史就要以司马迁为榜样。

导师曾经提醒他，要关注中国历史中的“老生常谈”，从不同角度观察可以得出不同的想法。在9日的座谈会上，史景迁说，很多历史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在在他看来历史有很多的观察角度，也很复杂，“历史牵扯这么多的人，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得到不同的想法”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史景迁受房兆楹指导，对康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专攻中国近代史。当时故宫博物院不少文物迁台，许多材料都藏于台湾。在房兆楹的帮助下，史景迁来到台湾，接触到故宫许多尘封档案，包括康熙的朱批奏折，“这些对我早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”。在很多场合，史景迁说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康熙，他的第一本著作也

是他的博士论文，便和康熙有关，书名叫《曹寅与康熙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结合档案史料，写了康熙皇帝的统治术与内心世界。这部著作受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赏识，但卖了二十年，第一版都没卖完，直到史景迁成名才一卖而光。

引起更大反响的是他的第三本著作《康熙》，史景迁化身康熙，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，发挥历史想象，“重构了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”。这本书很快成为畅销书，史景迁独特的历史叙事手法也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注意。9日讲座的互动环节，有读者问他最愿意和哪位皇帝交朋友。史景迁的回答是“康熙”，“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、研究与写作中国历史的过程，我依然会选择康熙。他相当灵活，他爱钱但并不如命，他爱他的众多子女组成的大家庭，他有帝国设计，他也是第一个一对一接见西方人的皇帝，甚至去学了一点外语”。

### 从个人遭遇关注历史的大变动

史景迁讲故事的天赋在他1978年写作的第四部著作《王氏之死》中得到更多的展现，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自《郟城县志》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，此外他还参考了蒲松龄的小说《聊斋志异》。他的学生、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在该书的序言中说，这本书把镜头推移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，“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，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，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”。当然，这本书也为他招致不小的争议，正统史学家认为这本书用文学材料写历史，并不科学。

不过，喜欢的读者恰恰认为这

是史景迁的独特所在。在史景迁的另一部著作《天安门》中，他将天安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象征，以康有为、鲁迅、丁玲这三个人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事件，呈现当时的社会思潮、人物性格，还有他们的历史处境。如同郑培凯所说：“史景迁的基本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，遭遇是他们个人的生活，而出现这些遭遇的环境就是历史。”在郑培凯看来，中国学者在学西方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，喜欢讲历史的潮流，“经常把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个人抹杀掉，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认识比较欠缺”。

7日，史景迁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主题是“在国家之下，清初的社

会交往与历史世界”，讲座里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历史上并不为人所知的人物沈福宗。沈福宗在清朝康熙年间的1686年来到伦敦，史景迁的兴趣在于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与英国人沟通。在讲座里，他从沈福宗入手，从清代贸易摩擦讲到民间交流系统。

史景迁的确具备讲故事的能力，读者也不满足于从他的书中读故事，此次中国行，就有读者问他：“如果清朝有网络，你觉得雍正会如何使用？”史景迁回答说：“雍正应该会很喜欢互联网，他是个很讲求效率的人；同时因为没有事情逃得出互联网，他应该会在上面发帖然后回复。”